

目录 CONTENT

► 青年评论

朱心容	城市“留白”式更新，是精致还是浪费？	/ 2
朱心容	人形机器，替身还是牢笼？	/ 4
罗依晴	流量狂欢的背后：别让镜头打扰人间烟火	/ 6
江雨萱	标本虽无言，规则须有声	/ 8
熊俊	奖项为镜，理性观诺奖	/10
江雨萱	别怕玩梗，花鼓灯本就是玩出来的 ——再思非遗“闪身步”出圈之争	/12
高婷雨	在失去之中锚定生命的重量 ——评余华《活着》	/14
黄雅勤	流动的中国，需要被看见的温度	/16
施欣政	“幽灵外卖”背后，责任不能隐身	/18
杨坤楠	短视频重塑的是阅读的入口	/20
邓子秀	于人间烟火处呼唤和平 ——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	/22
李雅姿	跳出“夺冠”喧嚣 ——郑钦文荣光下的沉潜	/24

1. 城市“留白”式更新，是精致还是浪费？

朱心容

傍晚路过一处刚完成改造的老旧小区，围墙拆了，露出里面一片空地。场地未修建亭台、健身器材与塑胶跑道，仅保留数棵老树与石凳；新铺草皮的边缘仍裸露出泥土。一个老人坐在石凳上，什么也没干，就那么坐着。旁边新立的牌子上写着“留白空间”。

这大概是近年来城市更新里最安静的一个词。别的改造项目忙着往里塞东西，它却忙着往外腾东西。拆掉违章建筑，清走堆物，把原本被水泥封死的角落打开，留出一块什么功能都不预设的空地。有人叫好，说这是给城市喘口气；也有人皱眉，土地资源紧缺，改造腾挪出的空间不建设停车场、增设电梯或补齐公共配套，仅保留空地，是否属于资源浪费？

批评的声音不是没道理。老旧小区最缺的从来不是风景，而是功能。停车位紧张，老人上下楼困难，管线老化，管网淤塞，哪一样不比一块空地来得迫切。把宝贵的改造资金和土地资源用在一个“看不出用途”的空地上，在投入产出比的账本上，确实不好看。

但事情怕细看。回望苏州那些园林，回望江南那些老街巷，中国城市从来不缺“留白”的基

因。拙政园里那面白墙，米芾画里那大片不着墨的纸，古人管这叫“计白当黑”。但要注意，古代园林的留白，是私园的留白。墙内是主人的山水意气，墙外是市井的逼仄拥挤。那种留白服务的对象，是少数人。今天老旧小区里的留白，服务的对象是全体居民，是要在逼仄拥挤里给所有人匀出一口呼吸。本质已经变了。

变了的地方在于，古代留白是权力的展示，当代留白应当是权力的让渡。一块空地放在那里，不预设用途，相当于把决定权交还给了使用它的人。今天可以是老人晒太阳的地方，明天可以是孩子放学后追逐的场地，后天也许有居民提议放几张乒乓球台。这个决策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小规模民主训练。比起开发商替居民决定“这里该建什么”，留白等于把笔递给了居民，让他们自己画。

有人会问，那为什么不干脆开个听证会，一步到位问清楚大家需要什么，再建什么？问得对。但真实的小区生活里，“大家需要什么”往往是一个伪命题。老人要凉亭，年轻人要快递柜，上班族要停车位，租户可能只想要一个能晒被子的地方。利益诉求的碎片化程度，远超一张问卷能覆

盖的范围。留白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不急于回答“要什么”，而是先承认“需求是会变的”。今天建了凉亭，明天觉得挡光，拆掉重来成本更高。留白是给未来的需求变动预留的缓冲垫。

当然，留白不能成为懒政的遮羞布。有的地方打着“留白”旗号，其实就是资金不到位、规划没想清楚，先拿块空地糊弄过去。这种伪留白，比不改造更可恶，因为它消耗的是居民对更新工作的信任。真正的留白，应该是经过民意征询、方案比选、反复协商之后，仍然认定“不急于填充”是当下最优解。前者是逃避，后者是决断。判断标准也简单：看这块地有没有后续的居民参与机制，有没有定期评估使用状况的约定，有没有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再调整的弹性。

城市更新走到今天，已经过了大拆大建的阶段。那种推倒重来的干脆，被证明会割断社区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渐进式的、协商式的更新，成了更受认可的方向。留白如果只是停留在“留

一块空地”的物理层面，那它确实配不上“精致”这个词；但如果把它理解为一个持续协商的空间载体，那它就是更新过程中最便宜、最灵活的一种社会实验装置。

说到底，留白不该是城市更新的终点，而该是起点。它先承认我们不知道居民要什么，然后腾出空间，让居民自己慢慢回答。这个过程可能笨拙，可能缓慢，可能不如一块塑胶跑道那样立竿见影地出现在验收报告上。但一座城市的成熟，未必体现在它填满了多少空白，有时候也体现在它有没有勇气，保留一些尚不确定的、等待居民自己书写的空间。

那块空地上的老人还坐着。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到刚好覆盖住整片草地。他也许不知道这叫“留白”，但他知道，这地方比从前舒坦。这大概就是留白最朴素的注脚：不急着告诉人们该在这里做什么，而是先让人们待得住，待得舒服，再慢慢商量。

责编 陈采奕 王玉宝

2. 人形机器，替身还是牢笼？

朱心容

一百多年前的底特律街头，福特流水线上的工人们发现事情起了变化。过去一个熟练技师要花几天才能装好的底盘，如今每个工位只负责拧几颗螺丝，节奏由传送带定。几年工夫，汽车价格掉了一半，马车夫和铁匠铺的伙计们站在路边，看着那些铁壳子呼啸而过，心里清楚某种东西彻底结束了。今天的人形机器人产业，正站在同一扇门前。门后是量产，是价格下探，是进入工厂和仓库。人们兴奋地谈论着技术奇点，却很少有人问一句：当年那些被流水线改造过的手艺人，他们的后代还好吗？

把时间轴拉长，事情就变得清楚了。汽车业的故事之所以值得重讲，不在于它发明了新的动力机械，而在于它重新定义了人与工具的关系。流水线没有消灭人的劳动，它把复杂劳动拆成简单动作，然后再把简单动作交给机器。每次这样的拆分，都伴随一排排工人从“工匠”降格为“操作员”，再从操作员降格为替补席上的看客。人形机器人正在做相同的事，它一开始笨手笨脚，在展台上摔跟头博观众一笑，然后有人把它放进流水线试错，让它搬箱子、拧螺栓。等到误差率降下来，成本算得过来账，它就会像当年那台 T

型车一样，从实验室的宠儿变成车间里的常客。

这一轮量产的标志性变化，不是机器人学会了走路，而是它们开始被允许犯错了。展会上的表演赛要求百分百完美，工厂环境却允许一定的容错率，只要效率算得过来，摔倒了爬起来就是合格员工。这种务实的转向值得肯定，它意味着行业从比拼关节灵活度、表情逼真度的炫技阶段，进入到了比拼故障间隔、维护成本和场景适配度的工程阶段。聪明的企业已经开始挑选那些人类自己也不太想干的活：搬运重物、在高温或粉尘环境里巡检、重复上万次的拆装动作。在这些岗位上，人形机器人的劣势，比如耗电大、速度慢、价格高，反而容易被容忍；而它们的身形优势，能走楼梯、能弯腰、能使用人类设计的工具，则成为真正的卖点。

但这里藏着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汽车流水线当年消化的，是大量只受过基础教育的移民工人，他们无可失去，也无可再降。今天的人力市场面对的挑战完全不同。仓储分拣、餐厅传菜、养老院陪护、厂区巡检，这些岗位吸纳着大量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是人形机器人落地最直接的靶点。技术升级的代价不会均匀分摊，总有人先被挤出

电梯。当机器人的成本降到雇佣一个全职员工的临界点以下，企业没有理由不换。这不是道德问题，是算术问题。而算术从来不同情弱者。

更麻烦的是，这一轮替代发生在教育体系完全没准备好的时候。当年汽车业兴起，社会好歹花了半个世纪慢慢消化产业工人的转型，职业学校和社区学院源源不断输送新的技能。今天，一个初中毕业的仓库工人，要经过多久的再培训才能学会维护一台由神经网络控制、液压伺服驱动的类人机器？恐怕没有人能给出答案。现行的职业教育体系大多还停留在教人操作固定的自动化设备上，而人形机器人的维修和调试，需要的知识跨度远超传统蓝领培训的范畴。如果技能更新的速度追不上岗位消失的速度，那量产的每一条好消息，都会变成某个家庭餐桌上的坏消息。

当然，把眼光放得更远，人形机器人未必是下一个铁笼。它也可能成为解放者，把那些磨损膝盖和腰椎的重复劳动接过去，让四十岁的人不用在流水线上站到静脉曲张。关键在于社会准备用多快的速度把教育、社保和职业培训的底座重新浇一遍。当年福特把工人工资提到行业两倍，

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产品只有富人买得起；今天机器人公司需要的，是在机器替人的同时，替人找到新的位置。这不是靠几句温情脉脉的企业责任演讲能解决的，需要把职业培训当成基础设施建设来投入，把转型期的保障网织得足够密。

回望那辆T型车的时代，它碾碎了无数旧生计，却也铺开了公路时代的地基，催生了加油站、汽车旅馆和郊区住宅。每一次工具革命都同时是生存方式的革命，人形机器人带来的不仅是一个新行业，而是对所有“靠身体吃饭”的职业的重新定价。在这个再定价的过程中，没有谁能保证自己是站在正确的一边。乐观者看到的是效率与解放，悲观者看到的是失业与焦虑，而现实往往走在两者之间：老技能贬值，新岗位长出来，中间隔着一段难熬的换挡期。与其争论机器人该不该量产，不如把力气花在缩短那段换挡期上。教育的重构等不起，技能培训的转向等不起，社会保障的适应也等不起。技术不会停下来等人，但人可以决定，是主动站到机器旁边，还是站在原地，看着车间里的灯一盏盏灭掉。

责编 陈采奕 王玉宝

3. 流量狂欢的背后：别让镜头打扰人间烟火

罗依晴

互联网的出现，搭建了人与人交流的桥梁，让彼此陌生的人成为了“网友”；智能手机的普及，实现了人与人皆可记录与传播，让任何人都能成为“博主”。尤其是抖音、微博等网络平台的涌现，让人们找到了情绪的宣泄口，分享欲决堤，这个世界自此进入了“自媒体时代”。

起初，人们的镜头里还是一盘美味的菜肴，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是一阵美妙的笑语，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们记录着自己的小确幸，分享着自己的小幸福。后来，在流量变现带来的巨大诱惑下，有的人未经他人许可，将镜头对准了无知无觉的路人，将他人的一举一动发布到网上，让他人成为自己吸引流量的工具。更有甚者，为博取眼球，自导自演，编造冲突，制造话题，引爆热点，挤占公共资源。

鸡排哥爆火后，无数博主为博流量纷纷涌到鸡排哥的摊前排队打卡，长长的队伍让鸡排哥应对不暇，他因长期劳累未能及时回应博主的需求，从而被发布在网上，被指责其不再能提供情绪价值；绍兴葫芦爷爷走红后，又吸引了一群人在他屋前进行实时直播，严重打扰了葫芦爷爷和邻里的生活，葫芦爷爷也不堪其扰地提前摘掉了葫芦。

其实第一个发布视频的人的本意是赞扬鸡排哥的高超情商和追忆童年动画的美好时光，而过度追求流量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用持续不断的曝光消耗美好情感，挤压个人空间。

流量的力量是巨大的，同时也是恐怖的。它可以轻而易举地造就一个神，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毁掉一个人。我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流量裹挟着带上宝座，成为镜头趋之若鹜的对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突然拉下神坛，落得满盘皆输，一身狼狈。但我们应当知道的是，只要流量至上的风气没有改变，鸡排哥绝对不会是这场战役中的最后一个，葫芦爷爷摘掉葫芦也许是这场角逐中最体面的下场。

人的天性就是爱看热闹，而这一天性恰恰成为了流量快速膨胀的心理基础，流量说到底就是曝光度和关注度，这往往离不开广大网民对视频的点击和访问。人们看看视频，关注时事，这本无可厚非。然而一些博主为追逐流量，刻意摆拍剧本，制造冲突，吸引大量网民进行围观。然而大量的网络围观会逐渐突破公共秩序的界限，打扰当事人的正常生活，甚至一些人被煽动着对当事人进行网暴，这无疑是践踏了法律红线，为法

律秩序所不能容忍。

“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网民看到的，只是视频发布者想让网民看到的，并非事情的真相。随手的一个点赞，一条评论，一个转发，落到无辜的当事人身上就是沉重的枷锁。在网上，似乎每一个人都成了判官，能够随意对他人进行所谓的道德审判，能够肆意围观他人的生活。

花儿需要阳光的滋养，但没日没夜的关照会葬送花儿的生命；真相需要曝光，但持续不断的曝光会演变成镜头的霸凌。面对社会热点，我们不妨克制情绪，拒绝盲目跟风；多方求证，辨别信息真假；敬畏法律，守住言论边界。

引流需谨慎，围观要适度。网络本是我们记录和分享美好生活的工具，莫让其成为损人害己的利器。

责编 谢刘宇 王玉宝

4. 标本虽无言，规则须有声

江雨萱

带孩子参观博物馆，本意是好的。但如果参观中家长放任孩子破坏展品，那这趟博物馆之行，孩子究竟学到了什么？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濒危动物展厅内的一幕，把这个问题摆到了公众面前——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莽山原矛头蝮标本前用手抓、用脚踢，甚至脱下鞋子拍打。随行的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反而将两件标本从展台上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在场游客曾出声提醒，但涉事家长未予理会。最终，莽山原矛头蝮标本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裂，舟山眼镜蛇标本因拍打导致颈部皮张破损、腹部两侧开裂。

这不是“熊孩子”一时顽皮那么简单。当成年人面对孩子的不当行为时，第一反应不是制止，而是参与其中，事情的性质就变了。比起孩子无知的冒犯，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一个成年人，会带着孩子一起越过那条“禁止触摸”的线？

标本的珍贵，远非一件“展品”可以概括。被损坏的莽山原矛头蝮是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濒临灭绝。而眼前这件标本，还有一段特殊的来历——由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技工作者陈远辉先生无偿捐

赠。1984年，陈远辉在医治蛇伤病人时首次发现这种未知毒蛇的线索。为了研究和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他先后九次被蛇咬伤，中指落下终身残疾。一件标本背后，是几代科研、保护工作者留下来的心血。它记录着濒危物种的形态特征，更凝结着一位科研工作者半辈子的坚守。一旦被破坏，难以复制。博物馆里禁止触摸标本，不是随意给游客定规矩，而是有明确原因的。手上的汗液、油脂会腐蚀标本；标本不可再生；部分标本残留防腐药剂，孩子摸完后不洗手再接触眼口，存在健康风险。标本是真实的动物，不是模型，随意摆弄是对展品和其捐赠者的不尊重。而涉事父亲不仅把标本当成了玩具，更在无形中向孩子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规则是可以被无视的。

然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事件发生后的家长反应。博物馆监控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并通知保安上前交涉，但家长起初拒不承认触摸标本。直到保安提醒“摸了标本要赶紧洗手”，家长才带着孩子去洗手间清洗了两分钟。从矢口否认到匆匆洗手，这一细节暴露出的，是比无知更可怕的东西——明知故犯后的侥幸与逃避。博物馆馆长张劲硕说得好：“问题不在于小朋友，孩子不懂

事我们能理解。但家长居然拿着标本到处跟孩子比划、打闹，这是非常不合适的。”

在法律层面，责任归属清晰。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未成年人造成的损害依法由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而随行父亲不仅没有制止，反而亲手将标本取下递给孩子，在法律上已不是简单的“监护不力”，而是损坏展品的共同参与者，理应承担赔偿责任。国家动物博物馆已完整保存事发全程监控视频，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博物馆正在开展定损评估。

但个案追责再严厉，也只是事后补救。值得深思的是，公众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把展品安全全部寄托于个人自觉。此次事件中，博物馆馆长也坦言，自然类博物馆将标本直接暴露摆放是行业普遍做法，主要是为了让观众获得更好的观感和体验。如果加上玻璃，反光会影响观察。然而，当“请勿触摸”的提示标语无法阻挡手抓脚踢的极端行为时，我们是否需要在观赏体验与妥当保护之间寻找新的平衡？修复完成后，馆方考虑将标本完全封在玻璃罩里。馆方坦言，加装玻璃罩会降低参观体验，但这已成为无奈的选择——

每一次不文明行为，都在迫使公共空间用更高的“围墙”来守护本该共享的文化资源。

人民日报评论说得好：敬畏生命、尊重规则、遵守公共秩序等基本教养的养成，比学会任何一个知识点都更重要。当一个孩子学了一肚子知识，心中却没有敬畏、眼里没有规则，实属本末倒置。孩子不只是通过大人的言辞学习规则，也会通过观察大人的行为理解规则。每一次不制止，都是在替孩子确认一件事：规则是可以不算数的。带孩子去博物馆，说明家长重视孩子的知识学习，但在“学知识”和“守规则”之间，还应该分清主次。

标本无言，却承载着物种记忆与科研汗水。它是科普教育的珍贵载体，也是我们认识自然、敬畏生命的窗口。文明参观，需要家长做好言传身教，也需要每一位参观者守住行为边界。毕竟，不是每次越界都有修复的机会，也不是每件标本都经得起伤害。当我们为孩子的学习焦虑时，或许更该思考：比起“塞”进脑子里的知识，我们有没有在孩子们心里“装”进更重要的东西？

责编 谢刘宇 王玉宝

5. 奖项为镜，理性观诺奖

熊俊

从设立至今诺贝尔奖已有百余年历史，所积累的学术信誉使它成为全世界上知者最熟悉的奖项。只要出现华人学者得到诺奖的消息，国内各类媒体及网络就常会兴奋地加以分析；若国内的科研突破未被提名为诺奖候选，有关评审制度的争议也往往会随之而来。国人对于诺奖评审体系的各种想法不只涉及奖项本身，而且可看作对科学素质进步的观察，是有关科研意义、学术价值判断的长期思考。早些时候多有人将诺奖作为科学成就的唯一标杆，受舆论影响而过分强调其光辉形象，现在则有更多地人理性地考虑科学评价的基础——既不盲目崇拜奖项，也不完全否定其用处。做科研要以求知、利世为出发点，持此信念去做事，远较执着于某一奖项更有价值。

国内舆论在较长时间内有走向两种极端的习惯。有人把诺奖当作绝对权威，将是否得奖看作判断某项研究价值的唯一标准。这种看法是与诺奖长期确立的学术传统有关的：所奖励的成果一般是经多年验证、对学科基本原理做过重大修正的东西，很多获奖的原始观察距实际应用甚至有几十个年头。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正是授予光遗传学类发现，当年有关单细胞绿藻趋

光现象的思考，无人能料到会成为分析神经网络的利器，所经历的漫长过程正好是诺奖所钟爱的类型。但学术价值不只可以按此一法来衡量。也有人在知道评审倾向后便彻底否定诺奖意义，将之简化为由特定地域、特定圈子主导的评选，完全不提它对全球学术沟通的促进作用。上述两种立场都欠公允，根本上未把“奖项认可”和“科学本身的价值”分开。

诺贝尔奖所依据的标准本身是历史性的、有偏颇的。按惯例而论，它把重点放在基础理论类的重大发现上，对工程方法或直接服务社会的技术成果所涉领域不作太多延伸。今年物理奖给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以肯定，正是对新式宇宙观察手段的表彰，是基本科学前沿的体现；化学奖讨论手性物质的自催化成因，也未偏离基础化学思路。但诺奖不能脱离既定制度来运作，每项奖只准有三名得主，不能充分承认群体合作的功绩。上述种种限制不是要否定该奖的价值，而是要说明：单靠一奖尚难概括所有科研的实际情况。

国人现在所谈的诺奖标准问题，本质上是有关国内学术评价体系的一次自我反思。就以往较长的历史阶段来说，科研评价中曾有“唯论文、

唯奖项”一类的偏向，外在奖项的分量被过分抬高。当科研思路趋于成熟之后，国内开始主动打破单一判断标准，把实际效果、对社会及产业的贡献纳入考察范围。国际奖项可以作为学术对话的媒介，今年的光遗传学或中微子类成果正是这种对话的实例，值得我们去借鉴思路；但不能把别国的评价方式直接套用于本土科研。杂交水稻、重大疾病防治、高原交通诸项课题都发源于国内现实需要，其意义即在解决困难、促进民生，所用方法乃至成果形态与诺奖偏好的单点突破没有必然联系，所以未必符合诺奖逻辑。若只拿诺奖的标准来看待本土科研，就可能低估应用研究所具有的社会价值。

科学所要求的评价不应该是单选题式的结论。诺贝尔奖虽是很有价值的参考，却不能当作唯一确定的答案。就诺奖本身来说要持理性态度：肯定其对基本性突破的褒扬，由今年各项基础类获奖内容去体会首创思想的力量，又清楚地指出评审制度所固有的一些偏颇或不足。科研的真正目标从无须专为某个奖项而设，而是不断把人类认知往前推移、以知识成就来配合时代的需要。对诺奖相关争议的冷静思考，正是中国社会及科学界日趋成熟的态度，这种成熟会帮助我们找到自主又开放的科研评价路径。

责编 谢刘宇 王玉宝

6. 别怕玩梗，花鼓灯本就是玩出来的

——再思非遗“闪身步”出圈之争

江雨萱

近日，安徽花鼓灯的基本功动作“闪身步”在短视频平台走红：灵动的身段配上魔性的节奏，引来天南海北的网友争相模仿翻拍，一门过去知者寥寥的国家级非遗，一夜之间闯进年轻人的手机屏幕。叫好声尚未落地，忧虑便接踵而至：切片传播割裂语境，玩梗消费稀释底蕴。这类担忧听多了，我倒想泼一盆冷水：我们是不是太习惯把非遗当成一碰就碎的瓷器，却忘了花鼓灯本来就是“玩”出来的？

翻开花鼓灯的来路就知道，它从来不是殿堂里的雅乐。它生在田间地头和庙会广场，是农闲时节庄稼人自娱自乐的歌舞，讲究的就是一个热闹、一份泼辣、一身即兴的机灵劲儿。当年村口看灯的百姓，图的是乐子，不是上课；艺人比的是谁的花样多、谁的身段逗得全场哄笑，也不是谁的底蕴讲得深。可以说，花鼓灯的生命力恰恰来自这种“玩”的属性——它是被一代代普通人玩熟、玩精、玩出规矩来的。今天年轻人对着手机学闪身步、比谁扭得更俏皮，细想想，这与百年前淮河岸边围观叫好的场景，骨子里是同一回

事。脱离群众才是非遗的死穴，而模仿恰恰是最古老的传承方式。

既然如此，为什么“出圈”总伴随着“警惕”？我以为是我们的文化心态出了问题。自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顶帽子戴上，不少传统艺术就被罩进了玻璃罩：谈论它必须正襟危坐，传播它必须配足解说词，仿佛不先讲清千年文脉，就没资格动它一根手指头。可这种“敬畏”，有时候恰恰是另一种形式的疏远。年轻人不是被非遗吓跑的，是被那份沉重感劝退的。一门艺术如果只能在解说词里被仰望，却不能在笑声里被摆弄，那它离真正的博物馆标本也就不远了。

当然，为玩梗辩护，不等于说流量天然正确。闪身步走红的风险确实存在，但病根不在“玩”，而在“只看一遍就走”的注意力机制。平台算法奖励的是三秒之内的刺激，花鼓灯里那些需要琢磨的东西——锣鼓与舞步的咬合、角色行当之间的对戏、一套动作背后的地域性情——很难挤进这三秒里。模仿的人学了个动作，却不知道这个动作姓甚名谁、从哪条河边走来，这才有割裂语

境之忧。换句话说，问题不是大家玩得太浅，而是玩完之后没有一条往深处走的路：视频火了，评论区里却找不到一句“这是安徽的花鼓灯”，更没有顺手可达的完整剧目和传承人故事。热度与深度之间断了层，错不在热度，在断层。

补上这个断层，其实用不着多么宏大的工程，缺的是“顺手”的功夫。平台给爆款视频挂上非遗词条和完整版链接，是顺手；媒体在追热点时多问传承人一句“这动作难在哪”，是顺手；而我们大学生能做的“顺手”之事更多——高校本是青年与传统艺术相遇最好的场域，社团可以借着热度请艺人进校办一场工作坊，让屏幕里的比划变成课堂上的亲授；学新传的同学不妨拍一条有注脚、有来路的非遗视频，用专业能力补上那缺失的“第二落点”；即便是普通观众，模仿之

余搜一搜花鼓灯的全本剧目，看看鼓点响起时整场的欢腾，也算没有白刷到这一回。从“刷到”到“看懂”，距离往往就这一条链接、一场演出的长度。

所以，面对闪身步的走红，我的态度是乐见其成，而不是忧心忡忡。不必急着质问模仿者“你懂它的底蕴吗”，就像百年前没有人会这样质问村口的看客。文化这东西，从来是先有人亲近，才有人懂得；先有人玩，才有人传。我们这一代人恰好站在屏幕与传统之间，与其站在一旁批评别人玩得浅，不如自己也下场去玩，玩熟了、玩懂了，再顺手把身后的故事讲给下一个人听——给花鼓灯松一松绑，让它大大方方回到人群里被摆弄、被喜爱，这本身就是青年能做的最好的传承。

责编 谢刘宇 王玉宝

7. 在失去之中锚定生命的重量

——评余华《活着》

高婷雨

当文学作品反复探讨人生价值时，很多作品习惯于将生命的意义绑定于功名、成就与收获。余华的《活着》却跳出这套评判逻辑，借福贵跌宕的一生抛出尖锐命题：剥离所有外在的拥有之后，人活着本身，是否依旧具备价值。小说通篇遍布离别与失去，但它并非对苦难进行刻意歌颂，而是冷静审视普通人承受命运的方式，重新定义生存的尊严，这也是这部作品历经多年依旧能够叩击当代读者内心的根源。

很多读者初读《活着》，容易把福贵的选择简单归为逆来顺受的认命。纵观全书，福贵并非没有挣扎，只是他的抗争不是激烈的呐喊反抗，而是一种沉默的承担。从富家子弟跌落为贫苦农民，战争、动荡接连席卷他的生活，至亲一个个离他而去，最后只剩他和一头同名老牛相伴于田野之间。余华没有渲染撕心裂肺的控诉，反而采用平淡克制的叙事语调，让福贵平静地讲出自己的悲剧遭遇。这份冷静不是麻木，恰恰是历经浩劫之后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命运的重击无从躲避，但人依然可以守住自我生命的阵地。“活着的力

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这里的忍受不等于放弃思考，而是接纳生命全部的复杂性，接纳幸福与痛苦共同构成人生。

《活着》的深刻之处，在于将个体命运放置于时代洪流之中进行观察。福贵个人的悲欢离合，背后映射着社会变迁留下的印记。时代浪潮裹挟小人物向前奔走，个人很难完全掌控自己的际遇。但余华没有把福贵完全写成时代的牺牲品。纵然外部世界反复夺走他珍视的一切，他依旧保留内心的温情。晚年耕田之时，他会吆喝老牛，念起家珍、凤霞、有庆这些逝去家人的名字。那些逝去的亲人没有化为怨恨，而是沉淀为他生命的记忆底色。这一点打破一种常见的认知：生命的意义未必来自占有，也可以来自铭记与承担。人可以失去财富、失去亲人，但记忆、善良以及继续生活的勇气，是命运无法掠夺的东西。

与此同时，这部小说也留给当代青年一组值得思辨的问题。身处物质条件相对优渥的当下，

我们很少经历福贵式的生存绝境，却常常陷入另一种精神困境。不少人习惯用世俗标尺衡量自我价值，把学业、就业、财富当作活着的全部目标。一旦目标落空，便容易全盘否定自身存在。《活着》恰恰提供了另一种参照：人生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得到多少，也取决于我们如何面对失去与挫折。福贵一无所有依旧认真耕耘土地，这份生存姿态提醒我们，成功不是活着的唯一标准答案。挫折、遗憾、平凡本就是人生的组成部分，接纳生活的不完美，本身也是一种生命韧性。当然，我们不必复刻福贵的生存方式，也不应该美化苦难，但可以借鉴这份精神内核：即便境遇不尽人意，也不轻易否定生命本身。

但也应当看到，小说的叙事选择同样存在可供思辨的空间。作品着重书写个体对苦难的承受，相对弱化了个体向外抗争的力量。读者阅读之时，

应当分清文学艺术表达与现实生活的边界。面对现实世界的不公与困境，承受不等于一味妥协退让。个体坚守内在生命尊严的同时，社会层面的改善与争取同样不可或缺。阅读《活着》，不是教人安于苦难，而是教会我们看清苦难之后，更加珍视现世的安稳，懂得守护身边的温暖。

时至今日，《活着》依旧能够打动一代代青年，并不因为它讲述了足够离奇的悲剧故事，而是因为它直面一个永恒命题：何为活着。福贵的一生告诉我们，意义并非全部来自外界赋予。当一切外在依托被剥离，好好活下去，守住内心的温度，就是生命沉甸甸的价值。对今天的我们而言，读懂《活着》，便是学会正视得失，在喧嚣浮躁的环境下，寻找到属于自己立足生活的精神支点。

责编 谢刘宇 王玉宝

8. 流动的中国，需要被看见的温度

黄雅勤

在国庆节期间，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能看到许多旅游相关的帖子。其中我注意到，除了分享旅行中的喜悦，也有部分网民抱怨着人潮涌动的景区和望不到头的等位队伍。有句热评这样说到：“中国人就像一整个 zip 压缩包，一到假期就会被解压。”现在，国庆假期已经结束，车站、机场、高速服务区又归于平静。假期是短暂的，“流动”却是这个时代最日常的底色。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有多少人出了门，而是为什么今天的人们能够如此自由地奔赴向往的远方，又在这奔赴背后体现出了什么。

由旅游而带动的人流量变化能够成为常态，其背后是基础设施的长期积累。高铁网络越织越密，高速公路向县域延伸，小城的酒店、餐饮、交通逐步补齐短板。路通了，人才愿意来；来了之后有得住、吃得好、走得顺，这样才能形成经济增长的正循环。这是发展的结果，也是发展的见证。但基础设施只是骨架，真正让流动有温度的，是服务和治理的细节。开放政府食堂、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设临时停车位——这些看似微小的举措，才是“流动中国”真正的软实力。

然而，流动也在考验着我们的另一面。景区

超载、酒店违约、商家“一锤子买卖”的心态，仍时有发生。当人们满怀期待奔赴一座城，却遭遇坐地起价、服务缩水，这种失望消耗的不只是假期的愉悦，更是对一座城市、甚至对“出行”这件事本身的信任。流动越是频繁，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就越重要。一个真正成熟的流动社会，不仅要有能力让人来，更要有底气让人愿意再来。

更深一层看，流动改变的不只是出行方式，更是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过去旅游只是“去远方看风景”，如今更多人愿意去小城蹲菜市场、进老街看非遗、在陌生城市过几天日常，感受当地的人文文化。这种从“观看”到“融入”的转变，说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在深化——不再满足于抵达，而是渴望体验；不再只关心“有没有”，而是追问“好不好”。这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谁能提供真实的体验、真诚的服务、有质感的日常，谁才能真正留住人。

作为青年，我们既是流动的参与者，也应是理性的观察者。我们在高铁上刷手机、在景区里拍照、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却未必认真想过：为什么这些流动能成为可能？为什么一条新路能改变一个县城的命运？为什么有些地方游客来

了还想来，有些地方去了一次就不想再去？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在教科书里，而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之间。

流动中国不只是一个经济现象，更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在交通、文旅、治理、契约精神上的长板与短板。读懂家国，不需要从宏大叙事入手。它就藏在高铁窗外掠过的风景里，藏在县城

小馆升腾的热气里，藏在深夜服务区那盏还亮着的灯里。青年人的责任，是在喧嚣中保持清醒，在热闹中看见问题，在流动中理解一个复杂而真实的中国——既看见进步，也追问代价；既享受便利，也思考如何让下一个假期、下一个人，被更好地对待。

责编 谢刘宇 王玉宝

9. “幽灵外卖”，责任不能隐身

施欣政

在近些年中，不少人已经养成了点外卖的习惯，只挑那些有堂食门店的商家，以为这样至少能避开不安全的店。但现实未必如此。平台上一些评分很高、销量可观，甚至标榜“明厨亮灶”的店铺，其实正是“幽灵外卖”。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对美团、京东、饿了么、抖音等7家平台开出合计35.97亿元的罚单，原因就是这些平台放任“幽灵店铺”在平台上经营。所谓幽灵店铺，是指证照虚假、甚至根本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却照常接单营业的商家。消费者在手机里看到的，是一家评价良好、证照齐全的店；真正在后厨做饭的，可能只是一间藏在老旧居民楼里的无名作坊。

幽灵外卖早已不是零散的个案，而是一条相当成熟的产业链。有的商家一口气在多个平台挂出378家“连锁店”，线下却找不到一家实体门店；证件做得十分齐全，执法人员按照公示的地址上门，看到的却只有一排车库。商家接下订单后，再把订单转入“转单宝”之类的第三方平台竞价派单，谁报价低就交给谁，最终真正出餐的，是消费者自始至终不曾见过的商家。在这条链条上，平台、幽灵店铺、转单平台各得其利，而由

此产生的食品安全风险，却几乎全部压在了消费者身上。

于是问题随之而来：平台在这桩生意里，真的能够置身事外吗？恐怕不能。平台掌握着最大的流量入口，佣金、单量、流水都来自消费者的每一笔订单。既然从交易中获利，就理应把好资质审核这道关口。可现实中，不少平台对幽灵店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甚至与转单平台相互配合，纵容它们在规则边缘游走。生意红火时来者不拒，出了问题便以“我们只是平台”为由推脱。说到底，这是一种权衡之后的选择：平台抱着侥幸心理，宁可承受被处罚的风险，也不愿放弃纵容幽灵店铺带来的流量与佣金。然而靠钻空子经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一旦失去消费者的信任，平台赖以生存的基础也就动摇了。

从更大的背景看，幽灵外卖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平台经济高速扩张时期责任缺位的一个缩影。平台在前期的野蛮生长中，把规模与流量当作唯一的追求，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一再放宽，甚至流于形式。当审核沦为走过场，风险便无可避免地向链条最底端的消费者转移。一张罚单可以惩戒个案，却补不上机制上的漏洞——只要平

台的收益依然与订单量直接挂钩，而纵容的代价远低于守门的成本，幽灵店铺就难以真正绝迹。

正因如此，治理的关键在于把“事后追罚”前移为“日常约束”。一方面，监管应当把重心放在源头，借助技术手段让证照、经营场所、实际出餐主体在平台上真实可查，山东推行的线上线下双核验正是在这一方向上的尝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把食品安全责任与平台的切身利益绑定，将资质审核、抽查核验写进平台的准入与

清退规则，让失守的商家与纵容的平台共同承担后果。责任只有落实到具体机制上，才不会停留在表态层面。

说到底，一份外卖端到消费者手里，背后是一整套关于信任的契约：商家守规矩，平台守门槛，监管守底线，任何一环失守，最终买单的都是普通人。幽灵外卖的教训提醒我们，商业的繁荣若以牺牲安全为代价，反噬的将是整个行业，以及所有认真做事的人。

责编 谢刘宇 王玉宝

10. 短视频重塑的是阅读的入口

杨琄楠

上学期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四百多页的书，借期一个月，最后只读到第八十几页。还书那天，我在路上刷完了三个关于这本书的解读视频，加起来不到二十分钟，心里居然涌起一种“大概了解了”的踏实感。这件事让我发现，被改变的可能不是我的阅读能力，而是两件事：一是我进入一本书的方式，二是我在真正读完之前获得满足感的效率。

“短视频正在毁掉阅读”这个说法，这几年几乎成了共识。但它一旦被当成道德问题，讨论就容易停在“现在的年轻人太浮躁”这类抱怨里。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一个分配问题：注意力总量没有变，短视频拿走的是通往长文本的那一段路。

先看可见的事实。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数据多年来并没有剧烈波动，成年国民人均一年读四五本纸质书，平均每天读书二十多分钟，而每天接触手机的时间早已超过一小时，其中短视频占了不小的一块。也就是说，书没有消失，时间被重新切分了。更值得注意的不是“读书的人变少了”，而是“读书的方式变了”：很多人了解一本书的第一站，现在是三十秒的书评视频，而不

是书店的书架或朋友的推荐。

变化的第一个机制是切换成本。心理学里有个说法叫“注意力残留”：人从一件事转向另一件事时，前一件事的思维片段还会在脑中停留一段时间，恢复深度专注往往不是几秒钟的事。刷视频的节奏是每十几秒一次强反馈，读一页书却可能需要几分钟才有回报。于是每一次从手机切回书页，都像重新启动一台刚关掉的机器。这不是意志力的问题，是成本的问题。

第二个机制更隐蔽：意义由谁供给。读一本书，意义得由读者自己一页一页搭起来，这个过程要消耗意志力；看解读视频，意义是现成的、被压缩好递到面前的。一个人已经很累的时候，选择后者几乎是理性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放下手机多读书”的倡议通常无效——它把结构性的问题，当成个人品德的问题来处理。

所以我并不认为短视频是阅读的敌人，它更像一个能力极强的“入口”。它把原本需要逛书店、查书单、听人推荐才能完成的事，压缩进了几十秒。真正的问题在于，很多人把入口当成了终点：看完解读就算读过，知道了结论就不再翻开原书。书评视频说得再好，也只是别人读完之

后的成果，让人跳过了自己和文字纠缠的那两个小时。

承认这一点之后，可行的办法反而变得具体了。

先改环境，比指望决心可靠。与其反复要求自己“专心”，不如在开始读书时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用二十分钟的计时器替代“读到不想读为止”这种模糊目标。人很难对抗习惯，但可以改变习惯发生的条件。

再降低门槛。不必要求自己“读完一本书”，可以先给自己一个每天二十页的下限，允许跳读，允许读到一半换一本。很多放弃不是因为读不懂，而是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得太像任务。

更关键的是让入口通向书。看完一个喜欢的解读视频，当场去搜原书的第一章，读过之后再判断那位博主的说法对不对。把“被说服”变成

“去验证”，短视频就从替代品变成了导读。

学校层面能做的也不复杂：图书馆或书院可以固定一个“无手机时段”，课程里安排一些必须连续阅读才能完成的任务，读书会少一点轮流分享读后感，多一点带着具体问题去读的讨论。这些做法都不宏大，但它们改变的是环境，而环境比决心可靠。

我并不担心短视频会终结阅读。人的注意力从来都是被争夺的，从前是茶馆和电视，现在是推荐算法。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我们看了多少短视频，而是下一刻看什么由谁决定。如果入口交给了算法，而读什么、读完留下什么仍然由我自己决定，那么这次重塑未必是坏事。我只是希望，别让自己一辈子都停在那个不到二十分钟的“大概了解”里。

责编 谢刘宇 王玉宝

11. 于人间烟火处呼唤和平

——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

邓子秀

傍晚路过一处刚完成改造的老旧小区，围墙拆了，露出里面一片空地。场地未修建亭台、健身器材与塑胶跑道，仅保留数棵老树与石凳；新铺草皮的边缘仍裸露出泥土。一个老人坐在石凳上，什么也没干，就那么坐着。旁边新立的牌子上写着“留白空间”。由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把故事放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一座虚构的中东城镇里。中国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龙餐馆掌勺谋生，战争爆发后，他在废墟中守着一群孤儿。这部电影的反战落点不在“战场上发生了什么”，而在“战争如何让一个人连好好做一顿饭都做不成”。国产战争片习惯从宏大的战役切入，而这部片子把镜头对准了灶台——枪炮声越响，厨房里那口锅就越沉默，这种反差本身就构成了对战争最有力的叩问。

全片的支点是“吃饭”。前半段镜头贴着灶台走：一道“龙抬头”怎么起锅，一锅东北铁锅炖怎么炖，拍得很慢，很有耐心；后半段炮火落下，同一口锅、同一条街道被掀翻，痛感正是从前半段铺垫的烟火日常里生长出来的。观众先记

住了这顿饭，才知道失去的是什么，“好好吃一顿安稳热饭”本身成了和平最有力的隐喻——几乎不需要刻意的说教，观众自己就懂了。文牧野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让观众先爱上烟火气，再亲手把它砸碎，痛感因此有了具体的落脚点。

撑起这口锅的人，不是一个英雄。徐福这个人物的力量，正是来自他的“不英雄”。他来中东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理想，只是为了赚钱还债。当炸弹落下的时刻，他的第一反应也是赶紧跑、赶紧回国，但老板老扎用半数餐馆股份把他留了下来。后来他被美军关进监狱，又被极端组织抓去当厨师，一路都是被推着走，直到马俊生死在他面前，他才真的下了决心带着孩子们一起逃亡。这种转变不是一次觉醒，而是普通人在极端处境下被良知一步步推着走的过程：从只想赚钱回家自保，到遵从内心的选择。他不是救世主，只是一个被战争逼到绝境的普通人，而正是这个普通人的坚持，才让“和平”这个词落了地。

影片中最难受的情节是那些被武装势力裹挟的孩子：在本该天真的年纪，却被训练成人体

炸弹，被美军称作“恐怖分子”。镜头没有刻意渲染血腥，只把年纪与冰冷的指令并置，碾压感便扑面而来。徐福那句“没有你们，哪来的恐怖分子”，则把追问还给了制造战争的人。

影片并没有停在追问上，而是把答案放回了那间餐馆。龙餐馆本身，就是影片中精妙的隐喻——食材下锅、火候升腾、香气四溢和人影来往，这里维系着人世间基础的秩序与善意。然而战争闯入这里，让灶台变成掩体，让餐馆沦为废墟。徐福没有在战场上反抗，而是在厨房里坚守，他不拿枪，只颠勺。这种“用日常抵御暴力”的姿态，比任何枪林弹雨里的英雄主义都更接近反战的本质——战争最可怕的不是摧毁建筑，而是剥夺人好好生活的权利。当炉火重新燃起，锅铲仍

在翻炒，那不是对战争的胜利宣言，而是对战争最固执、也最温柔的抵抗。

我们谈起战争的残酷，第一反应往往是炮火与爆炸，而这部电影让人看到的是：本该坐在餐桌前吃饭、在街巷里奔跑的孩子，被硬生生推上冲突前沿，沦为纷争的工具。影片不展示战争的胜负，只展示战争对日常生活的吞噬——街道没了，餐馆没了，孩子没了。平凡日常的背后，藏着最沉重也最珍贵的和平分量。

“龙餐馆只有和平和美食”这句台词立住了全片的精神内核，这份力量不是来自空洞宏大的理念，而是来自一个握了一辈子锅铲的厨师对安稳生活最朴素的执念。把普通人的这点诉求讲透，比拍上百场爆炸更有分量。

责编 陈采奕 王玉宝

12. 跳出“夺冠”喧嚣

——郑钦文荣光下的沉潜

李雅姿

当中网决赛的ACE球落定，郑钦文躺倒在钻石球场蓝色的硬地上。作为中网创办二十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她捧杯的画面迅速刷屏各大社交平台。热搜上，“逆袭”“王者归来”成为叙事的主调，鲜花、掌声与冠军光环，几乎构成大众对这场胜利的全部想象。我们为她“夺冠”的瞬间欢呼喝彩，却往往忽视了她耀眼荣光之下，交织着伤病挫败与自我打磨的沉潜之路。唯有跳出“夺冠”的喧嚣，方能领悟：成长真正的内核，不在世俗意义上“夺冠”式的胜利，而在于沉潜低谷里的自省、打磨与自我接纳。

这份荣耀的来路，布满不为人知的坎坷。将时间拨回2025年7月，郑钦文因右肘肱骨外上髁炎接受手术，开启了一段充满波折的康复周期。急于重返赛场的她，术后仅仅88天便选择复出，却因仓促参赛导致伤情进一步恶化，在中网赛事中途伤退。曾经站上世界第4位的她，受困于反复伤病，排名一路滑落，最低跌至世界第160位，不得不持外卡参加高级别巡回赛，一次次从资格赛重新打起。外界质疑之声接踵而至，不少人断

言她难以重回顶尖行列。

面对外界的唱衰，她没有执着于快速拿到胜利、重回巅峰，而是选择沉潜，向内调整自我。她暂时淡出公众视野，前往佛罗里达开启封闭式训练，放下昔日顶尖选手的骄傲，沉下心打磨技术短板，学着接纳状态低迷的自己。熬过漫长的调整期之后，她从美网资格赛顽强突围，一步步找回比赛节奏，最终站上中网决赛赛场。

世人偏爱“触底反弹”的爽文叙事，热衷于放大最终夺冠的高光时刻，却习惯性过滤低谷之中那些煎熬、试错与自我怀疑。媒体乐于渲染“浴火重生”的传奇，把复杂的职业挣扎压缩成一句励志口号，仿佛低谷仅仅是通往胜利的铺垫。其实，比起“夺冠”的瞬间，漫长的低谷与沉潜更有淬炼人的力量。郑钦文曾坦言，低谷未必全是坏事，那些失意的日子，逼迫她看见自身技术短板，学着接纳状态糟糕的自己，重新学习怎样打比赛。

郑钦文这段沉浮的经历，照见的不只是网球场胜负悲欢，更映射出当代青年共通的精神

困境。一如舆论执着于冠军奖杯，身处内卷环境中的我们，也常常追逐即时的成功，渴求属于自己的“夺冠”瞬间。绩点高低、竞赛奖项、实习录用，都成了世俗意义上的“奖杯”。我们不自觉被这套标准裹挟，把成就的取得等同于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很难接受一段没有高光、无人喝彩的蛰伏时光，难以接受失败之后的沉潜之路。当付出迟迟看不到回报，我们便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误以为一次落空便是全盘的失败。

而沉潜，恰恰是走出这种困局的最佳选择。它不是放弃努力，而是在失利之后向内深耕。竞赛折戟，那就完善项目、打磨方案；面试屡屡落空，那就复盘短板、补充经历；考试失利，那就调整学习方式、重新搭建知识框架……这份默默

耕耘，很难快速转化为非凡的成就，却在一点点补齐能力短板。正是这段沉潜，悄悄夯实我们抵御挫折的底气。正如郑钦文所说，低谷是看清自己的契机。沉潜的价值，不在于它必然能够通向万众瞩目的胜利，而在于这段时期带给人的自我审视与内在生长。

别只看见世俗定义下的“夺冠”。奖杯终会蒙尘，一时的热度终将消散，而在失意当中学会自省、在压力之下守住本心的能力，才是青年人最珍贵的财富。真正的成长，不在于“夺冠”的一瞬间，而在于学会接纳路途的曲折，懂得在沉潜之中积蓄力量，认清自身局限却依旧保有向前的勇气。

责编 陈采奕 王玉宝

▶ 青年评论

HNNU YOUTH MEDIA



本版责编：青年编辑部

版式设计：视觉艺术部

本期 1 版 总第 17 期

2026 年 10 月 25 日 星期日